

# 从《著砚楼读书记》看潘景郑对图书的考鉴

郑华栋

**摘要:** 在《著砚楼读书记》中,潘景郑对图书的作者、校语、版本、递藏源流、成书时间和亡佚时间进行了细致的考鉴,其中对图书版本的鉴定则大致以序跋、讳字、他书、内容文字、牌记、纸墨、版式、字体和藏印这九个方面为依据。

**关键词:** 《著砚楼读书记》;潘景郑;版本鉴定

**作者简介:** 郑华栋,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G256.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6.06.013

潘景郑(1907—2003),原名承弼,字良甫,号寄沔,江苏吴县人,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和藏书家。他一生与书为伴,在目录、训诂、金石、词曲、书法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为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著砚楼读书记》是潘景郑所撰504篇序跋题记的汇编。由该编可知,潘景郑以图书为中心,对其作者、内容、版本、递藏源流以及书内藏印的真伪等各种要素进行了全面考鉴。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详尽了解《著砚楼读书记》著录的每一部图书的相关信息,也有助于正确认识潘景郑的图书考鉴成就。

## 一、考订图书的作者

图书与作者的关系十分密切,故讨论图书时往往难以置其作者于不顾。我们在一些图书中可以窥知与该书作者相关的明确说明,但在有些图书中却很难找到,这就需要我们费一番功夫,通过使用各种考订手段,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作者的真实情况。潘景郑读书时,每遇有不明之作者辄予以考订,并记录于其所撰序跋中。如潘氏读《明通鉴》,最初不知其为何人所撰,但通过比较该书与《群书疑辩》的议论风格和稽考《庙制图考》的跋语,便可断定《明通鉴》为万斯同之遗著。此为据他书考订作者姓名。又如潘景郑阅《刑统赋解》时发现“从第三韵‘观夫首从之法有正而有权’句起,引按中有平江路云”<sup>[1]315</sup>,按平江路为元至元十三年所设置的行政区域,潘氏据此判断该书为元人所撰。此为据名物制度考订作者所处时代。再如潘景郑通过查考《咸淳临安志》的相关记载,最终确定《箫台公余词》的作者姚述尧为钱塘人。此为据方志考订作者籍贯。

## 二、考订图书的递藏源流

范凤书说:“私家藏书在世代你我之间‘旋聚旋散’,又‘旋散旋聚’……一部书往往传递多人,甲失乙得,乙散丙聚,并未真亡。”<sup>[2]625</sup>这就是说,中国私家藏书的聚与散如同一个矛盾内部的两方面,二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也就是图书流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图书的递藏源流早已模糊不清、无从知晓,

但有些图书或由于其“身体”上记录了些许反映自身过往的信息，或由于这些信息有幸被载入他书，故其递藏源流仍然明晰可辨、有迹可循，从而为考订工作提供了便利。潘景郑十分关注其所藏图书的递藏源流，并常常在必要时予以考订。如潘景郑通过累累藏印，考得《万柳溪边旧话》先后由惠氏红豆书屋、戈氏翠薇花馆、袁氏卧雪庐和缪氏艺风堂收藏。此为据藏印考订一书递藏源流，它是潘氏最为常用的手段。又如《玉几山房听雨录》的稿本旧藏于钱塘许乃钊，该书卷末有许氏跋语，称将其赠予魏稼孙。潘氏由是知该书后归魏氏。此为据跋语考订一书递藏源流。再如潘氏跋明正德本《博平县志》说：“是本旧为天一阁藏本……今归怀辛斋案头，是书惟天一阁目著录，当即此帙。”<sup>[1]190</sup>此为据书目考订一书递藏源流。图书的递藏源流往往影响着图书的价值，因此无论是收藏家还是书贾都对之格外关注。而后者又经常钤其所伪造之名家藏印于书内，以此虚构流传轨迹、提升图书价值，从而达到欺罔买家，获取厚利的目的。潘景郑经眼的古书甚多，考鉴经验十分丰富，故对于书贾的作伪伎俩，往往能轻易识破。如书贾为制造明刻本《埤雅》曾为毛晋所藏的假象，遂于书内伪造毛晋藏印，潘氏一望便知其为伪作。另如旧钞本《高粱生集》、宋本《金石录》两书内皆钤有伪印，然皆难逃潘氏慧眼。

### 三、考订图书的成书时间和亡佚时间

对一书的成书时间的考订是潘景郑图书考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潘氏阅书十分认真，往往能从书中敏锐地捕捉到反映该书成书时间的只言片语。如其所藏《皇元征缅录》内称元英宗为今上，潘景郑由此判断该书成于至治之初。此为据内容时限考订成书时间。除考订成书时间以外，潘景郑对图书的亡佚时间也有所考订。与前者不同的是，后者往往以他书为材料依据。如《陶隐居集》在《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均有著录，但却并未载于《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之中，潘氏遂判断该集尽失于宋。

### 四、考订校语

潘景郑十分关注其所藏校本中的校语，并对之常有考订。如旧钞本《国寿录》中有朱笔校语，潘景郑审为吴騫手笔。此外，对稿本《桃溪书画录》、刻本《前尘梦影录》和钞本《行朝录》《郡斋读书志》《癸巳剩稿》《郑氏周易》等书中校语的作者，潘氏亦能依据笔迹得知。这主要是其在藏书、读书的过程中得以频繁过目名家字迹，从而对他们的书法风格逐渐精熟的缘故。但有时只据字迹很难准确判断一书校语的作者，因而必须结合其他条件。如碧筠草堂初印本《笠泽丛书》中的校语“皆细楷精整”，劳平甫、劳季言父子的字迹均有此特征。但据潘景郑所知，“季言于唐代故闻致力尤勤”。而潘氏“证诸是书所引用，皆以唐著为主体”<sup>[1]452</sup>，遂由是判断校语出于劳季言之手。除校语的作者以外，潘景郑还将校语所据版本和校语撰写年代纳入其考订范围之内。如程荣本《大戴礼记》内有王庆麟校语，潘景郑由王氏题识得知其校语所据为雅雨堂本。此为考订校语所据为何本。又如程荣本《风俗通》内有黄彭年校语，潘景郑取之与卢文弨所辑《风俗通义校正并拾遗》互勘，发现二者所据异文基本相同。因此，潘氏推断黄、卢校语所据版本当同出一源。是为考订不同校语所据各个版本间的关系。再如重刻本《水经注》内有洪亮吉校语，除卷尾注明借读年月外，按语犹自称“礼吉”。潘景郑由此知校语乃洪氏早岁所为。是为考订校语撰写年代。

## 五、对一书版本的鉴定

版本鉴定是版本研究的第一步工作,它有助于我们正确判断某一版本的价值,从而去更好地利用它,发挥其应有的作用<sup>[3]163</sup>。作为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潘景郑在数十年的藏书活动中,凭借着水滴石穿之功积累了丰富的古籍版本鉴定经验,解决了众多版本鉴定难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兹以《著砚楼读书记》为材料依据予以介绍。

### (一) 依据序跋

序跋往往是刻本书内的一部分,它一般会记录该本的刻印情况,这在客观上为古籍版本的鉴定提供了便利。因此,潘景郑常常将之作为重要依据加以利用。如潘景郑跋通津草堂本《韩诗外传》曰:“前有至正钱惟善一序,审其源出宋槧。”<sup>[1]8</sup>艺海楼钞本《说论集》内有陈士壮跋语,潘景郑由是知该本录于《四库全书》本。此为依据序跋鉴定版本源流。如明刻本《东吴名贤记》内有周复俊自序,潘景郑由是知该本刻于万历二年孟夏。此为依据序文鉴定版本刊刻时代。又如潘景郑藏有元至正刻本《中吴纪闻》,跋之曰:“后有至正二十五年武宁卢熊一跋,谓‘此书原本访求历年,遂得校正增补,尚恨未完’,又称‘原有明之子昱所叙行实附后’,今此本无之,知元槧已非完本。”<sup>[1]205</sup>此为依据跋文鉴定版本完缺。又如潘景郑记录浚仪本《金石录》内赵不翦跋语:“赵德父所著《金石录》,侵板于龙舒郡斋久矣……惜夫易安之跋不附焉,因刻以殿之……”潘氏由是知“易安后序,龙舒初刻无之。浚仪本始附入”<sup>[1]256</sup>。潘氏又检赵敦甫献于公府之宋本《金石录》,未发现内有易安后序和赵跋,故判断该本刻于龙舒。此为据他本跋文鉴定古籍刊刻地点。另如潘景郑跋元刻本《赵松雪集》曰:“十卷后有花溪沈璜跋语云:‘今从公子仲穆求假全集,与友原诚郑君再加矫正’云云,则此本当为沈氏所梓矣。”<sup>[1]481</sup>此为依据跋文鉴定古籍刊刻者。再如黄丕烈藏有明弘治活字本《古贤小字录》,其跋以为无“昆山后学吴大有较刊”一行者为初印本,有之则为后印。潘景郑以之检览其所借之本,知开卷增此一行,遂判断“此本为后印者”<sup>[1]412</sup>。是为据跋文鉴定同本刷印先后。

### (二) 依据讳字

陈垣说:“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sup>[4]237</sup>作为一种历史现象,避讳由于随意改字而给古籍整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同时又因所避之讳具有时代性而为古籍版本的鉴定提供了重要线索。因此,明清以来,许多版本学家都借以推断版本时代,潘景郑亦常为之,兹举数例以见一斑。如张金吾藏有所谓北宋残本《魏志》,该本“避讳至‘构’字”<sup>[1]62</sup>。“构”乃宋高宗名讳,潘氏据此知该本并非北宋刻本。又如潘景郑藏有旧钞本《明通鉴》,书内“弘”字不缺笔,潘氏由此知该本写于清乾隆以前,当为清初写本。

### (三) 依据目录、文集等他书资料

鉴定一书的版本固然需要注意该本本身的内容和形式,但并不能完全局限于此。事实上,参考书目、文集等相关图书亦是鉴定版本的有效途径。潘景郑深谙此理,并将其充分运用于具体的版本鉴定过程中,从而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鉴定成果。如潘景郑跋其所藏明初黑口本《坤雅》说:“自来藏家著录之本,无有出其右者。书贾射利,往往取是本充元槧……”<sup>[1]28</sup>潘氏通过查考多种藏目,获知明初黑口本当为《坤雅》流传至今的最早版本之一。这样一来,元本的真伪问题便能得到初步澄清。再结合其他条件,则元本之伪便可最终确定。又如蜀人朋九万著有《乌台诗案》一书,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作十三卷,潘景郑据此知今所传寥寥片帙并非完本。此为据书目鉴定版本完缺。再如顾千里《思适斋集》以为汪氏艺芸书舍重刻衢本《郡斋读书志》内小学类中当划分六段,自第二段以下皆为错简。潘景郑以此审视王

闻远手校衢本《郡斋读书志》，知其“沿讹未正”，遂判断“是所钞与汪本同出一源矣”<sup>[1]212</sup>。此为依据文集鉴定版本间之关系。

#### （四）依据内容文字

内容文字是古籍的主要组成部分，亦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在版本鉴定的过程中，潘景郑常常将相同或不同的本子间的内容文字加以比对，从而考知版本优劣、完缺、源流和制作时代。兹举数例以见他对此法的具体应用。如潘景郑曾得刘刻本《说文问答疏证》，取之与姚本对勘，发现“姚本间有一二正刘之误”，由是得出“其精审盖居刘本上矣”<sup>[1]34</sup>的鉴定结论，此为依据内容文字鉴定版本优劣。又如鲍氏知不足斋据写本刻有《万柳溪边旧话》，潘景郑“自许氏怀心斋假得旧钞本，以校鲍本”，发现“首尾无异”，遂判断旧钞本《万柳溪边旧话》“当与鲍氏所据同出一源者”<sup>[1]160</sup>。此为依据内容文字鉴定版本源流。另如潘景郑借校许氏怀心斋所藏钞本《砚笈》时发现“卷三《玉砚章》‘乾道中范成大使虏’句，曹本（指清曹寅刊本——笔者按）已改‘虏’为‘金’”，遂判断“彼为明钞本无疑矣”<sup>[1]369</sup>。此为依据内容文字鉴定版本制作时代。再如潘景郑曾将《梵麓山房笔记》的抄本与《己卯丛编》本相比对，发现前者较后者多一卷，遂断定《己卯丛编》本并非完本。此为依据内容文字鉴定版本完缺。

#### （五）依据牌记

牌记亦称墨围、书牌、碑牌、木记，按其在书中的位置可分为两类：一类出现于序后、书后、目录末、卷末或封面页背面，此为牌记的一般形式；一类则出现于卷端或版心处，此为牌记的特殊形式<sup>[3]164</sup>。古籍出版单位通常将其刻于书中，以反映出版单位、出书的时间和地点等版本信息，故它对于鉴定版本有重要价值。因此，潘景郑常据之鉴定一书版本，使很多难题涣然冰释。如潘氏藏有慎独斋覆元中统本《史记》，明人为充元槧而割裂该本序跋。“惟卷十八《汉高功臣年表》后，有正德九年夏五月慎独斋刊行木记一行”，潘景郑以为此乃“剗剩未尽之痕”<sup>[1]50-51</sup>，从而断定是本为明正德本。此为据牌记鉴定版本时代。又如潘氏藏有旧钞本《奇忠志》，内有“碧凤里史氏小隐堂镂本”一行，潘景郑据此断定该旧钞本出于刊本。是为据牌记鉴定版本源流。再如明嘉靖本《渔石集》的版心下刻有“福建余子茂”五字，潘氏由是知该本刊于闽中。此为据牌记鉴定古籍刊刻地点。

#### （六）依据纸墨

作为制作古籍的必备材料，纸和墨往往对版本鉴定有重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古籍的纸墨具有时代性，这一特征可以帮助我们鉴定版本产生的时代；第二，古籍的纸墨精善粗恶不一，我们据此可以鉴定版本的优劣。潘景郑熟谙历代古籍用纸用墨的特点，并常常以之为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如潘氏藏有宋刊元修本《国语》残本，他指出：“缪氏艺风堂藏本与此正同，惟缪藏是明成化册纸印行之本，而此书犹是元代麻纸印本，较缪本为尤善矣。”<sup>[1]81</sup>此为据古籍用纸鉴定版本优劣。又如潘氏通过细审其所借之残宋本《后村居士集》的纸质即断其为元代印本，此为据古籍用纸鉴定刷印时代。再如《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有《历代钟鼎彝器款式》元刊朱印三本，然潘景郑认为“蒙古铅槧，未有朱印也”<sup>[1]41</sup>，遂否定了《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的元刊说，如此则十分有助于确定该书真正的刊刻时代。

此外，潘景郑还常常综合考察古籍纸墨的特色以鉴定版本。如其藏有《赵松雪集》共两帙：其一本“纸墨清朗”；又一本“刷印较晚，纸墨亦较敝”。潘氏由是判断后一本“逊前本远甚”<sup>[1]481</sup>。此为综合考察古籍纸墨特色以鉴定版本优劣。又如潘景郑藏有旧钞本明季野乘五种，并为之跋曰：“审纸墨尤是乾、嘉以前写本。”<sup>[1]110</sup>再如潘景郑跋旧钞本《山书》说：“审纸墨当亦乾隆以前所写……”<sup>[1]120</sup>而对于书贾的以新充旧之举，潘景郑亦能据纸墨鉴别。如书贾将明刊本《野客丛书》中之序跋割裂无遗以充宋槧，然潘氏以为“纸墨刻画，望而可辨”<sup>[1]384</sup>，其为嘉靖刻本无疑。此均为综合考察古籍纸墨特色以鉴定其制作时代。

### (七) 依据版式

版式指书版的样式,可大致分为边栏、行款和书口三部分<sup>[5]245</sup>。同书异本的版式往往不同,但若相同,则各本之间一般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此外,受不同时代、地域的影响,古籍版式的风格特征多不相同。因此,对版式进行研究是鉴定版本的辅助手段之一。潘景郑在为古籍撰写序跋时不仅十分注意对版式的记录,而且常常利用它为版本鉴定工作服务。如蓝格旧钞本《大金吊伐录》的款式与《墨海金壶》本相同,潘氏据此并结合其他条件,推断前者盖依后者传录。如震泽王氏本《史记》与庆元建安黄善夫本的行款悉合,潘氏据此并结合其他条件,推断两本同出一源。此均为据版式鉴定版本源流。又如潘景郑藏有刻本《臞仙肘后经》和《书史会要》,前者“行格每半叶自十一至十三行,疏密不等,版匡宽阔,版心上下粗黑口”<sup>[1]319</sup>,后者“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版心上下俱细黑口,上记字数”<sup>[1]320</sup>。潘氏据此版式特征,判断两书均刻于明初。此为据版式鉴定版刻时代。

### (八) 依据字体

在时代风气和传统习惯的作用下,不同时代、地区所制作的古籍,其字体往往各有特色。<sup>[5]259</sup>潘景郑不仅是杰出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同时还是有名的书法家,故精熟各种字体的特色,这对于鉴定古籍版本十分有利。如拜经楼所藏九行十八字本《晏子春秋》之为元刊向乃不易之论,然潘景郑通过细审该本字体结构,认为其并非元刻,而是正、嘉以前雕本。此后潘氏又通过检览书目、比勘别本等手段使其判断得到进一步证实。又如潘景郑藏有明刻本《陶渊明集》,该集“不著刊刻年月,前后亦无明人序跋”<sup>[1]441</sup>,潘氏通过字体推断为嘉靖、隆庆间刊本。此均为依据字体鉴定版本时代。再如潘景郑通过审辨字迹便能确定其所藏《云山日记》为劳巽卿手写本。此为依据字体鉴定写本制作者。

### (九) 依据藏印

藏书印起源很早,据说东晋就已出现了私人藏书家的印章。唐代以后,官府也开始在其藏书中加盖印章。但无论是私人还是官府,其钤印之举均为后人鉴定古籍版本提供了重要线索。潘景郑是著名的藏书家,故对古籍中印章的归属、种类、内容、特色、真伪了然于胸,以之为鉴定古籍版本的依据,自然驾轻就熟。如其所藏残本《元音》内有翰林院官印,潘景郑据以判断为四库进呈底本。此为依据印章鉴定版本用途。

#### 参考文献:

- [1] 潘景郑. 著砚楼读书记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  
 [2] 范凤书. 中国私家藏书史 [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1.  
 [3] 姚伯岳. 版本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4] 吴泽. 陈垣史学论著选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5] 莫砺锋. 程千帆全集: 第一卷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Books by Pan Jingzheng According to The Book Review of Zhuyanlou

Zheng Huadong

**Abstract:** In *The Book Review of Zhuyanlou*, Pan Jingzheng carried out a careful textual research on books' authors, notes, editions, delivery and possession, completion and disappearing time and editions wer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nine aspects, namely,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aboo words, other books, contents and characters, colophons, paper and ink, formats, fonts and seals.

**Key words:** *The Book Review of Zhuyanlou*; Pan Jingzheng; identification of editions

(收稿日期: 2016-09-15; 责任编辑: 朱世龙, 陈鸿)